

良渚 :最早的‘ 水上中国 ’

鲁晓敏 (松阳)

大禹治水的事迹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 4000 年,但没有留下佐证的文字和遗迹,西方学者对此并不认可。直到 1936 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施昕在杭州北郊发现了良渚考遗址,它的出现,将中国人治水史提前了千年！

随着数十年不断地发掘,良渚王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告诉今人一个铁一样的事实,5000 年前,中国人已经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国家,甚至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和最长的水坝。良渚人跨越时代的规划理念、先进的营造技术、发达的水利系统,超越了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史前文明,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

大禹治水是克除水患,良渚人的治水则是建设一个防洪、蓄洪、引灌兼备的水利工程。先看一下如何‘ 堵 ’:古城西北方向,一条‘ Y ’形溪流由西北向东南流淌而来,良渚人在溪流顶部两侧各筑一组水坝群,截出两座水库,在溪流底部建水坝,再拦出一座水库。3 组水坝利用地势落差将水流引到良渚古城及周围的盆地之中,基本实现了自流灌溉。

在良渚古城以北大遮山下,良渚人砌起一道 5000 米长的塘山坝群,数条纵横相交的坝体围成一个组合蓄水池。它横亘在大遮山与古城之间,汛期挡住大遮山奔泻而下的山洪,枯水期将涓涓细流收集到水池中,再利用地势注入平原低坝区,实现了‘ 东水西调 ’。

水是农耕之根本,水利是国家之命脉,只有将水‘ 堵 ’住,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灌溉之水,才有五谷丰登,才能积累雄厚的物质财富。这些水坝比城墙早建约一个世纪,由此证明,水利催生了良渚发达的农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后,良渚国才动手修建大型的城墙体系。

物极必反,良渚人深知这个道理,当库容暴涨时,他们就依托山间隘口作为溢洪道,进行开闸泄洪,这就是‘ 疏 ’,或者叫‘ 泄 ’。早在都江堰之前两三千年,天才的良渚人设计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水利体系,营建出了富饶的鱼米之乡。

3 个水库加 1 个蓄水池,蓄水总量达到惊人的 6000 多立方米,超过了 4 个老西湖！一眼望去,尽显一派烟波浩渺。仅仅傍湖还是不够的,穿梭在城内数十条曲折蜿蜒的水道,将良渚古城与周边的山丘、河网、湿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 山、河、湖、城 ”一体的格局。

11 条水坝,3 座水库,1 个蓄水池, 8 座水城门,51 条城内水道,环城壕沟,城外密如蛛网般的水渠,这只是良渚王国核心区的水利工程。3.6 万平方公里的良渚王国一定还隐藏着无数水利设施,它们支撑起了一个昌盛的良渚王国。

可以说,良渚是一个水利王国,它是最早的“ 水上中国 ”。良渚遗址作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 2019 年 7 月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以良渚为源头的 5000 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广泛的承认。

然而,这座巨无霸一般的史前水城,却在 4300 年前突然消失。我猜想,良渚的基因融入到了良渚文化中,催开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花朵。其实,良渚并没有消失,它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流淌了下来,我们每一个人承载着良渚的梦想,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停地遇见盛世良渚！

良,美丽 ;渚,水上之洲。良渚,一座浮在水上的美丽之城。我们走在良渚故地,今天已寻不着当年的水迹,却分明漾动着泱泱之水。忽然想到,看水不是水,看水还是水,这是水的哲学,这是水的至高境界。



远去的瓯江岸上的号子

王永健 (莲都)

对莲都大水门码头最初的记忆,是数不清的挑担子的和抱孩子的从对岸乘渡船来城里走亲办事的乡下人,更有那一张张鼓满风的白帆从幽蓝的瓯江水面上逆水而行的装满货物的木船乘风破浪,远远听得到江水簇拥船头的浪花声 ;江岸,一个个纤夫打着赤膊,拉着纤绳匍匐前行,洒下一路的汗滴和号子……

最早被号子的声势所打动,是在童年。那时听父亲熟悉的一位船夫说,温州到丽水的航段段有三十六弯七十二滩。那时瓯江上南来北往的运载粮食、木材、陶瓷、水产品、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船只川流不息,小轮船的汽笛声、纤夫的号子、夹杂着船仓里叫骂声,响成一片,构成一种水上交通特有的嘈杂喧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常常坐在水大门口,欣赏这热闹的风景。温州逆上的货船将抵达大水门船埠时,还得经过处在厦河与塔下交界沿线溪滩的相公滩和开门滩。因瓯江水流在古城岛南呈 S 型,弯处水势险峻水流湍急,时值寒冬清晨,江面雾气升腾,相传清朝时温州有位赴京城赶考的相公,乘坐蚱蜢船在此下船协同纤夫拉纤。纤夫们挽了裤脚上岸,在乱石滩上拔滩,故称此段溪滩为相公滩。再往上游的牛岭头,江面水势稍为平缓,当年瓯江南岸山陡如立,茫茫江面,烟波浩荡。江岸有两棵至少有 200 年以上树龄的苍松,枝干粗壮伸向四面八方,静默无语屹立在拐弯急流处的江岸边,守护着人称丽水的“ 景阳岗 ”,故称“ 开门滩 ”。一个偶然的涨大水退潮机会,我在水大门口“ 景阳岗 ”北岸看到,由七八只蚱蜢船组成的船帮,全靠人力顶着逆流拉纤的拔滩船夫,多则十来人,看着前方“ 嗨哟来起,嗨哟来起…… ”老船工亮开雄浑的嗓门吼起了号子。他们的号子声雄壮、震撼人心。号子在他们的口中,内容丰富、节奏多变,仅从号子声,便可以昭示出劳动强度的剧烈或低弱 :平缓而有节奏者,纤绳负荷较轻 ;洪亮而昂扬奋进者,肩上负荷较重 ;激越而声嘶力竭者,那是全力拼搏。可以想见,当时每一次拉纤的壮烈场面,犹如一次旷世少有的大合唱。号子,就如合唱时指挥者手中挥舞的小棒,它把纤夫们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拧成一股坚不可摧的生命之绳,每一道脉搏都同逆流而上的货船一起跳动,心往一处拧,劲往一处使,最终产生了强大的合力。

记忆没能忘记纤夫的形象,我记住了他们的勇敢和坚毅的神韵,他们用强健的身躯为船舟升起一道心中的长城,这长城绵延不尽。纤夫精神,是一座永远驻足在纤夫兄弟中的丰碑。纤夫形象的张力也因此“ 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她本身的存在 ”成为一道值得欣赏的多维风景美图。

当东方一轮朝霞被瑰丽的江水缓缓托向天空,号子鼓起纤夫理想的风帆,这是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强音 ;当灿烂霞光映射着山川和大地,映射着波光粼粼的瓯江,江面上一艘艘扬帆货船用明澈的音符组成了美的旋律和时代的凯歌。远处传来有线广播播出的电影《上甘岭》里的优美、舒缓的插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当年的瓯江风光,远去的帆影、号子将定格成我心中永恒的画面。

我与华严塔

洪峰 (龙泉)

一生之中,总会在某个时段,会与某个人、某件东西或某件事情密切联系,成就一段美好缘分,从而让当事人记忆深刻,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回味这份美妙、幸福甚至自豪的感觉。我与华严塔,正是如此。

龙泉历史上共建有四座塔。1956 年华严塔与崇因寺双塔被拆除,而最后一座古塔—— 稽圣潭塔,也不堪岁月重负,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不幸坍塌。至此,龙泉四座古塔均化成一缕轻烟,留存在史籍和人们的记忆中。

在龙泉四座古塔中,以华严塔历史价值最高。华严古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 977 年),其因塔内藏有《华严经》而得名。此经旁征博引,涉及面广,是研究华严宗教理和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当时塔内藏有《华严经》等佛经二三百卷,凭此,其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 可与敦煌发现 ’相媲美。华严古塔及其所在的崇仁寺也因此成为佛教华严宗圣地,是千年龙泉古城的象征之一。

塔在中国主要分为佛塔、风水塔、文峰塔三种类型。而华严古塔堪称文峰塔之典范,它犹如龙泉古城里的一座擎天文笔,凝聚了龙泉的千年文脉,浓缩了龙泉的百代文气,形成了龙泉的独特文风,催生了龙泉的代代文豪。自从有了华严古塔后,北宋天圣到南宋咸淳的 251 年间,龙泉连续不断出了 248 位进士,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实属全国罕见。

可惜,华严古塔于 1956 年 1 月被人为毁掉。毁塔修路,竟起念于“ 废物利用 ”,焚烧经卷,也意在“ 破除迷信 ”。古塔被毁,造成龙泉古城文化和佛教文物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千古憾事,也震惊中外。

华严古塔,曾寄托着龙泉先人对社会安宁的希冀和对民生富庶的期盼,在龙泉人心中,它不仅是景观、是标志,更是历史、是文化,犹如先人遗

留的手泽与财富。2006 年,初任市政协委员的我有幸成为调研组一员,参加了重建华严塔前期调研工作,让我有更多机会去关注和了解华严塔。2007 年七届政协一次全会期间,我提交了第一份政协提案——《关于重建华严塔弘扬龙泉历史文化的建议》,并被列入当年度市政协重点提案。同年市委、市政府广泛听取意见,因势利导,科学决策,将重建华严塔列入年度十件实事。

如果说参加调研组,参与重建工作前期,并为此撰写了我担任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份提案,是我与华严塔之间开启缘分之路的话,那么在此后两年内,我作为重建华严塔指挥部成员之一,直接参与重建工作,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前期调研、规划,塔址选定,宝塔风格、建设规模确定,募捐发动,工程奠基推进,落成典礼等全过程,再到后来又以重建华严塔为主题创作出诗歌作品《心灵之塔》,并荣获龙泉市‘ 项目百日攻坚战 ’文学大奖赛一等奖,则进一步加深了我与华严塔之间的缘分。

事实上,我与华严塔缘分还远远未结束。2010 年,我受命担任龙泉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华严塔》主编。在短短几个月内,去省博物馆、温州市档案馆,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和实物照片,还去过平阳县,找到了当时龙泉拆塔事件的见证人——著名剧作家尤文贵先生。

近几年,随着城市亮化工程的实施,华严塔已然成为龙泉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夜幕下的它,也不再孤单。以它为中心建成的崇仁寺,随着连续三届的“ 浙江华严文化节 ”的举办,早已成为享誉全省的佛教圣地。龙泉这座美丽的山水古城又增添了一处新的景点。

我与华严塔,这一生,结下极其深厚的缘。在这场缘遇中,所能做到的,我都尽力做到了。也许在我一生之中,这也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